
筛检和扬弃：近代江南女校教育中的传统文化

徐 宁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鸦片战争以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引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大转变,而女子学校的出现则突出反映并加剧了这种变化。在得风气之先的江南地区,女校发展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办学宗旨大相径庭的中西人士通过各种课程,向女学生乃至全社会传递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知识与东西杂糅的价值观念。不断发展的女校及其培养的渐趋成长的女学生,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改造,同时亦大力推动了江南社会的变迁。

【关键词】江南女校; 女学生; 传统文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加剧,在与西方深入持久的交流中,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下,国人不得不直面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沉重现实,开始了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层面向西方学习的漫长历程。^①在这一过程中,令国人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受到了重新审视、检验和扬弃。近代中国具有“古今中外各种时空因素多歧互渗”的突出时代特性,而“断裂与延续的交织鲜明地体现了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特点”。^②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可谓麦与稗共生、精华与糟粕同在,在西方先进文化的比照和冲击下,其中的陋习与弊病被一一筛检出,受到中国知识精英的批判,并逐渐被国人所抛弃。

近代江南最早的女子学校以及由国人最早开办的女校均诞生于东西方文化汇聚、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③多元汇聚的文化导致早期女校的创办者出现明显的不同,西方传教士、中国男性知识精英以及中国进步知识女性从不同的角度推动着女校的前进。由于办学宗旨的差异,他们向女学生乃至全社会传递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知识与东西杂糅的价值观念,或简或繁的课程体系成为女校塑造女性的重要工具,亦反映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态度。不断发展的女校及其培养的渐趋成长的女学生,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改造,同时亦大力推动了江南社会的变迁。

一、由“布道”到“救国”:近代江南女校办学宗旨的变化

中国传统社会虽有女子教育却无女子学校,传统女性在家庭中接受伦理纲常教化和家务技能训练以扮演孝女、贤妻、良母的角色。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传教士、商人、探险家的纷至沓来改变了这一状态。

收稿日期:2015-10-20

作者简介:徐 宁,安徽芜湖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妇女史研究。

近代中国，“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效劳”。^④ 这些传教士坚信，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但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敌视和排斥。旅居近代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析了当时传教士此种遭遇的原因：

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国家受到了耻辱，中国人认为袭击传教士也就是为国家的荣誉而战。传教士并没有参与上述(指鸦片贸易、战争等，笔者注)事情，但是当仇恨如黑色乌云一般席卷而来时，传教士作为中国人最容易接触到的外国人，立即受到闪电般的攻击。另外一些反对传教士的暴力行动是由于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有目的地在民众中散布谣言而引起的。^⑤

罗斯认为早期来华传教士和基督教文明在中国遭到抵制有两个重要原因：侵略战争引发的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和统治集团及士大夫为维护传统文化、政治制度而做的自我防御。为摆脱被抵制的命运，早期来华传教士开始尝试通过兴学校、创医院、办报纸等渠道来拓宽它的“布道”之路，兴建女子学校便是其重要工作之一。

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阿尔德赛(Aldersey)在宁波开办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女塾。^⑥ 1850年，美国圣公会格兰德(Gillette)女士在上海建立了“裨文”女塾，^⑦ 从此开启了近代江南女校的发展历程。教会女校的出现最初并未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且面临着资金、场地、招生、舆论等诸多困难。传教士的办学热情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无减，数十年间，他们在上海、苏州、杭州等近代江南的繁华城市建立了大量的教会女校。

教会女校陆续出现在近代江南地区的同时，部分中国男性知识精英不仅开眼看世界，主动了解西方文明，而且开始寻求中国在制度和文化上的突破。1892年，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女教》中提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开办女塾，以达到强国的目的：

诚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 富者出资，贫者就学，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奖其勤而惩其惰。美而贤者，官吏妥为择配，以示褒嘉。至于女塾章程，必须参仿泰西，整齐严肃。^⑧

比郑观应略晚，梁启超将女子教育提升到“保国、保种、保教”的重要地位，其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痛心疾首地批判了女学不兴的祸害：

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 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本原也。^⑨

在梁启超看来，女学之兴衰是国家强弱的本原，中国女子教育落后因而“祸天下”，中国要想强盛就必须改变女学落后的局面。1898年，爱国绅商经元善开办了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校——中国女学堂(又名经正女学、经氏女学^⑩)。此后，国人自办女子教育便渐成风气。这一时期的女校不仅仅是培养“贤妻良母”，而且开始培养“女国民”，同时注重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曾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其中申明本校“以教育女子，增进普通知识，养成母仪典范，而能使铸造国民为目的”；^[11] 同时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12] 同一时期，常熟竞化女校亦申明“以开通女子学识，普及女子教育为目的”。^[13]

随着统治危机的加剧,加之兴女学已成为时代潮流,清政府开始开禁女校,同时逐渐兴建官办女校。1907年,清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前者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14]后者则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15]辛亥鼎革之后,北洋政府在1914年12月公布《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对女子教育做了专门规定,强调女子教育应当“标示育成良妻贤母主义,以挽其委琐龌龊或放任不羁之陋习”。^[16]

女校是近代中国的新生事物之一,支持和兴办女校的主要人群可以分为西方传教人士、中国男性知识精英以及中国进步知识女性三大类。虽然都在推动女学发展,但是目的却有相当大的差异。西方传教士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基督化。在多数男性知识精英心中“兴女学可以兴母教、端母范,根本目的在于相夫、教子、兴国”。^[17]清末新政开禁女学,既是迫于社会的压力更是出于挽救统治的考虑。只有进步知识女性创办的女学,才更多地关注提高女子的自身素质、发挥女子的人格魅力。虽然如此,各种形式的女学却从不同的角度推动着近代女性的成长。同时,在女学以及受到女校教育的女学生的共同努力下,传统的江南社会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

二、新陈代谢:社会变革中的江南女校和女校课程

近代江南女校从19世纪50年代诞生后,在一次又一次社会变革中获得成长契机,女校办学主体身份复杂多样,办学宗旨也不尽相同。传教士、维新派、革命派、普通爱国民众乃至政府当局均以自己的政治抱负或目标来塑造女性,因此在课程设置中自然也就各有侧重。

1. 教会女校的“福音”教育

近代江南最早的教会女校“裨文”女塾,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对其他教会女校具有较强的引领示范作用。该校的女学生除了学习圣经、国文、算术以外,还学习缝纫、刺绣。当时,“教会女校均停留在小学阶段,水平低,其目标是吸收信徒,培养教徒妻子和女布道师。课程主要有汉语、圣经、数学、地理和英文”。^[18]

早期教会女校就读的女学生主要是学习读写类的基本知识,并开展手工、家务。基督教教义以及对圣经的学习是当时江南教会女校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最主要内容。从上海圣公会女校(该校创于1856年)女生一天的学习等活动即可看出端倪:

女孩们将她们一天校园生活中的第一个小时用于以地方语言学习福音上。然后她们一同吃简单的早餐,再做各类家务和家政。直到八点半,她们集合起来做祷告。九点到十二点,她们再次回到学校,学习本国语言的读写、有关基督教教条的各种问答,诸如此类的已有能力为她们准备的有用的基本科目。下午用于缝纫、刺绣等。^[19]

又如清心女中,其最初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唱歌、圣经以及家政。1899年时又开设英文课。^[20]又如文纪女塾,以“纺织、缝纫、园艺、烹调等女红为主,唯于上午略读浅易之圣经与四书而已。间有优秀分子,则稍习英文”。^[21]这种课程设置相对简单,女学生仅仅处于开蒙的状态。艺术类课程也得到重视,圣玛利亚女校在1903年就设立琴科。^[22]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上层人士开始认可教会女校, 教会也兴办了设施更加完善的女校, 以满足中国上层社会的需求。现代著名文学家茅盾回忆中西女塾时指出, 这所于1892年创办于上海的美国教会女校是个贵族化的女校, 学生都来自“高贵华人”家庭:

课程方面, 名为中西并重, 其实是专重英文。此外又教西洋音乐、舞蹈。还有一个家事实验室, 教学生如何组织家庭, 如何在家中和公共场所招待宾客, 开茶会、宴会、舞会, 并制西菜及西式点心。还有选修的表演课, 排演西方剧本的片段。每届毕业生的表演大会, 在上海的外国人和“高贵华人”中, 是极有名的。^[23]

中西女中开设音乐、表情法和舞蹈三门选修课。音乐课以钢琴为主, 全校约1/3到1/2的人选修。这三门课都是另外收费, 数目与学校的正规学费相等, 学成后另发文凭, 举行毕业典礼。学习内容都是外国教材, 当时在校内都成为“出风头”课。登台表演时, 往往引起学生和家长的羡慕和赞扬。同时也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学习。^[24] 教会女校示范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不仅改变了女学生的命运, 也震荡着传统江南社会的经济、政治、劳动等秩序以及伦理道德与社会日常规范。

教会女校设有家政课, 它既符合传统中国对女性家务能力的需求, 又展现了西方文化的特色。中西女塾刚开办时, 有刺绣课, 没有烹饪课, 因为厨房工作属下等, 而学生是“高贵”华人的女儿, 无须学。但学校本身又是宣扬美国生活方式的阵地, 因此要学生掌握西方的家事知识。1914年秋, 该校正式开设了家政课。第一年, 学生学习如何美化自己、如何美化家庭和环境。第二年, 仿效美国青年女学生学习如何对待男友、选择对象、组织家庭等等。第三年, 学习如何在家中 and 公共场所招待宾客, 如何开茶会、宴会、舞会, 以及怎样做西点、西菜等。

如果说, 家政课和艺术课在中国传统的女红家务和文学艺术上添加了西方元素, 那么, 英文和体育则是全新的知识了。清心女中相当重视英文课, “直接用英语授课, 学生用英语对话。高中其他各课除国文外, 亦都用英文原本”。^[25] 中西女校早期所用的课本, 除语文外, 一律都是英文版, 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出版的。为了增强女学生体质, 女子体操和舞蹈在教会女学中也有体现。

传统江南百姓希望女孩子在学校里能接受更全面的基础知识, 诸如伦理、国文、外文、数学、历史、地理、博物、物理、化学、教育、裁缝、唱歌、图画、体操等广泛的课程。^[26] 当然, 学校传授知识的过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罗斯记录了女校传授知识的方式:

在一所学校开办的早期, 女孩儿们学会了阅读但却不会写字, 因为学校要防止她们给男生传纸条! 在这所学校里, 教师只教学生读《圣经》, 那些女孩子已经记住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二十年前, 学校增设了许多课程, 包括自然科学、教会史、数学、地理和音乐。五年前, 又添加了英语和历史课程。^[27]

教会女校在数十年中不断发展, 其课程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整体来看, 近代江南教会女校在课程设置上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部分精华和实用的部分, 但更多地传播着近代西方的知识和观念。

2. 民办女校的“救国”主张

在教会女校渐趋成长之际, 伴随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女校益处的显现, 国人开始着手女子学校的实践。1898年6月1日, 中国女学堂(又名经正女学)正式开学。其招生广告显示, 欲收40名女学生, 且提出不收学费及饭费的优待。到正式开学时, 入学者却仅有十

余人。有资料显示入学者是16人：“16个属于较高阶层的女孩已经作为学生和寄膳者入学了，适度地交了310美元，这些钱包括所有费用在内。”^[28]首批女学生中绝大部分是熟人或开明士绅的子女，甚至还有这些人的姨太太。学校规定中西文功课各半，拟设中文、西文、算学、医学、法学、女红6门课程。^[29]在经元善等人的苦心经营与推广下，中国女学堂开始附设幼儿师范，旋又设立分校。经正女学的开办事宜被《万国公报》一一记录：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寓沪客绅经君莲珊等，议设女公学书塾，拟定规条，联名禀陈南洋节署，蒙刘岷帅批答略谓，此举有益，可开风气之先，并准刊用木质关防，以昭信守。……七月朔日，秋凉开塾，敦聘美国闺秀林梅蕊女史为西文总教习，而以华教习刘女史摄提调事。就学者日众，截至年终，共得40余名。……时则声名鹊起，远方童女，亦愿担簪负笈而来，通计总分两塾，凡任塾及报名而将到者都70余人。^[30]

在中国女学堂的开办过程中，经元善得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支持洋务运动的官员支持，也得到梁启超等倡导维新运动的知识精英的协助。该校课程兼具中西：

考其华文功课，如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十三经、唐诗、古文之类，皆有用之书也。外此，则女红、绘事、医学，间日习之。每旬逢三八日，则有教习试课论说。西学功课，于读书写字之暇，兼及体操、针黹、琴学之类，以资质之高下，定课程之多寡。^[31]国人自办女校在课程设置上和教会女校有明显区别。经正女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课程，且所占比例极大，女孝经、女四书等是必读之书，女红、绘画也予以承继。在此基础上，也兼及实用的西学知识，如体操、琴学等。

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国人自办学堂的课程也愈加丰富，加入了诸如地理、体操等新科目。1905年创校的无锡私立竞志女校，课程设置有：初小一、二年级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唱歌5科为必修课。高小三四年级及师范预科开修身、国文、算术、地理、图画、体操、唱歌7课为必修课。另设手工课为特科，分绒绳、编织及抽丝3种。^[32]

江南民办女校课程设置中突出了中国传统女红，如无锡的补公女学、竞成女学、学艺女学和振秀女学均教授刺绣，“各女学还举行文艺观摩会，将学生的刺绣、图画作品陈列展览，推动刺绣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33]如同教会学校总是不同程度地开设宗教课程一样，国人自办的女校中，“修身课”始终都处于重要位置，女孝经、女四书等是女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

清末10年，革命风潮渐兴，上海爱国女校甚至成为革命女校。在该校高级课程中，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注重炸弹制造；同时，该校还成为革命党人的招待和接洽机关，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等革命派均曾以该校为联络点。

无论课程是保守还是“激进”，民办女校的核心仍是落在“救国”上，凡利于“救国”的知识、技能或思想，均可一并“拿来”，不利于“救国”的传统糟粕如缠足之类则很快遭到批判和抛弃。

3. 官办女校的课程规范

随着教会女校和民办女校的发展，清政府最高统治者也开始关注女子学校。慈禧在和西方人士交流时，曾询问美国女生的课程是否和男生一样，并表示“非常希望中国的女孩也能受教育，但是人们在教育男孩上已有很大困难”。当对方解释了美国公立学校后，她说：“中国目前的税收很重，不可能再加诸如此类的费用。”^[34]无论是为迎合洋人故作姿态抑或是真的领悟了女子教

育的重要性,慈禧等最高统治者确实注意到了女子学校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趋势。李鸿章访美期间,曾接受记者采访,在被问及教育问题时认为:

在我们大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35]

1907年3月8日,清学部颁布“女学章程”,包含《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两部分。前者分立学总义、学科程度、考录入学、编制设备、监督教习管理员、教职义务6章,较为详备。该章程虽允许女子进入学堂学习,但依然将女性定位于家庭中,其规定师范科目为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13门,学制4年,每州县必设一所女子师范学堂。^[36]清政府承认女校合法地位,无疑对促进女学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女子小学堂章程》分立学总义、学科程度、编制设备、教习管理员4章。该章程规定,女子小学分女子初等小学堂和女子高等小学堂两等,均为4年毕业。小学堂科目包括修身、国文、算数、女红、体操、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音乐等。^[37]

上述两个章程在课程设置上基本一致,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的课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的课程比,仅少了教育一科,并用女红一科涵盖了师范学堂的家事、裁缝、手艺三科。两个章程的总体要求一致,都是希望培养女性的德性操守,传授知识技能,注重身体发育,最终有益于家庭和社会。

民国以来,在教育部公布的规定中,中等学校课程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校“加课家事、园艺、缝纫,但园艺缺之”,^[38]仍然强调女子在家政方面的知识技能。不可否认的是,女子教育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层次两个方面确实也所有进展:在课程设置上,女学生的课程除了加入缝纫及家政课外,其他课程基本与男校无二。

随着女校的发展,无论是教会女校、民办女校或官办女校,学校课程均走向规范化,女校的课程主要分为4块: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家政知识、体育运动。由于各自的办学宗旨不同,因此在传播思想观念、文化知识方面各有侧重。

三、成长与扬弃:女学生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西人士兴办女子学校的初衷大相径庭,但都对中国女性进行了重新塑造。无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中国知识精英,都认为中国传统妇女的知识技能已经不能满足时代需求了,必须通过学校来塑造新女性。社会对女性的认识和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着明显变化。

女校和女学生首先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随着社会风气的开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女性接受学校教育的益处。有一个有文化的女儿是家里的骄傲,娶一个有知识的太太是当时为数不少的青年男子的期望:

过去那种安静、枯燥乏味、没有头脑的妻子再也提不起人们的兴趣,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正在逐渐形成。大学毕业的年轻小伙儿都愿意选择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子做自己的妻子,在婚姻市场上,受过教育的女孩儿就像刚出炉的蛋糕一样走俏。^[39]

传统女性被束缚的双脚也开始获得解放, 罗斯记录了学校对女生放足的推动:

近日来, 那些倾向于基督教的思想独立的妇女已经开始下决心向缠足的陋习发出挑战了。大多数的教会学校不接受裹脚的女孩子入学。在那些允许裹脚女孩子入学的学校里, 由于受到周围同学的影响, 还没有完全屈服于保守势力的女孩子也都相对得到了解放。^[40]

缠足的陋习在女校和女学生的推动下逐渐松动和瓦解, 虽然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城市和社会上层, 但所起到的示范效应却非常深远。具备现代知识和健康体魄的女性形象开始获得社会的亲睐。女校也推动了传统婚恋观念的转变:

毫无疑问, 接受教育导致了婚龄的推迟。十年前, 大多数进入中学的女孩子都已经订了婚, 她们都非常感谢自己的父母允许自己接受教育。现在, 很多女孩子到了十九、二十岁也都还没有订婚。^[41]

毕业后的女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随着国人自办女校的不断增多, 社会对于知识女性的需求也在持续上升。很多女毕业生成了老师、主管甚至是校长。^[42]

生长于清末民初的新知识女性刘立明曾对清末的教会女学和私立女学进行对比, 她指出: 教会学校毕业的女生“其间不少浮华之辈, 偏重欧化, 不谙国情, 而多半能刻苦耐劳, 注重家事, 对于社会事业, 有极浓厚的兴味”; 而国人自办的务本和爱国两校“课程完美, 教授有方, 所以毕业的女生大多数能应对国情, 参加种种爱国及妇女解放运动, 但她们对于家事及社会事业的兴趣, 则没有教会女生的那般浓厚”。^[43]

江南女校的课程促进了女性的“强大”——身体之强和能力之强。不少知识精英将国人体质的孱弱归结于作为母亲的女性身体的虚弱。废除缠足和强化体育锻炼便成为女校的重要任务。很多女校在招生简章中都注明不收缠足女生, 在课程设置中均含有体操一科。大量女校定期开展运动会, 地方政府也时常组织男女学校参加的大型运动会。1910年, 一位上海绅士打算把两个女儿送入墨梯学校, 他询问校长: “你们教你们的学生骑自行车吗?” 当他得到否定的回答时, 他表示遗憾: “哦, 我想你们应该教。”^[44]

在身体和能力提高的同时, 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在增强。在当时西方人和部分国人的眼中, 教会学校的教学管理比官办学校更符合时代趋势, 因为“在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女校中, 女孩儿们只学规矩不讲自由”, 而教会学校则能“给予这些女孩儿摆脱旧风俗束缚的精神力量和必要的道德约束”。^[45]

女性只能做“家庭主妇”不得走入社会参与政治活动的传统观念也逐渐受到冲击和改变。清末新政以来, 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女校以及女学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无可避免地卷入各种变革和政治运动中。她们“通过接受家庭之外的学校教育进入了公共领域, 这预示着精英态度的一次重要转变”, 亦挑战了“妇女应该远离公共领域而保护自己的贞洁和品德”^[46]的传统观念。

四、小结

近代江南女校的出现,体现和加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其重视人际关系、同政治结合得比较紧密且带有非常强烈的宗法家族色彩。^[47] 由于江南女校的办学身份和背景复杂多样,因而女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也表现出了差异。

一方面,女校以渐进的方式吸纳了西方先进文化,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这种吸纳最初是被动的,西方传教士初创女校时由“洋人”主导。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进步知识精英开始主动向西方寻求真理,逐渐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思想文化引入到女校课堂。这些先进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和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女校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修身课程的设置,引导着女学生对人际关系的恰当把握。女红课则传递着编制刺绣工艺,将中国特色技艺发扬光大。

近代江南女校有力推动着传统文化的转变,这突出表现在女性观的嬗变上:在近代江南社会,无论是男性对女性的认识,抑或女性对自己的认识,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因素很多,江南女校恰恰能有效聚合各种有利因素,像一台加速器一般有力推动着女性观的嬗变。女性观是一种社会观念文化,是关于女性的社会意识,对女性自身的发展影响很大,具体指社会中关于女子特定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是对女子价值的根本看法。^[48] 中国传统女性观以“男尊女卑”为要旨,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三从四德”等一套儒家礼仪规范,这种尊卑观念不仅为男性所推崇,也被女性自身内化为人生信条。近代江南女校有力促进了民众对女性地位和价值等方面的不断反思。首先,在教育观方面,女校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随着社会风气的开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女性接受学校教育的益处。有一个有文化的女儿是家里的骄傲,娶一个有知识的太太是当时为数不少的青年男子的期望,“在婚姻市场上,受过教育的女孩子就像刚出炉的蛋糕一样走俏”。^[49] 其次,在婚恋观方面,女校改变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当早嫁人等陈旧观念和繁琐无用的婚嫁习俗。接受了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学生开始质疑传统的包办婚姻,挑战父母在子女缔结婚姻中的决断权,他们成为自由婚恋的尝试者。一些男女学生放弃了繁琐的中式婚聘仪式,而尝试采取西式教堂婚礼。再次,在职业观方面,毕业后的女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社会也开始接受女性进入职场。“随着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女子学校不断增多,社会对于知识女性的需求也在持续上升。很多教会学校的女毕业生成了老师、主管甚至是校长。过去对女儿上学的请求置之不理的父亲们,在听说接受教育的年轻女孩子能获得不错的薪水之后,态度也都发生了改变。”^[50] 女性自身也认识到经济独立对婚姻自由的重要性,开始追寻自己的一份事业。最后,在参政观方面,女性从家庭走入社会、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逐渐获得社会的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校在培养女学生的定位上逐步从早期的培养“贤妻良母”有了深度的超越,这一超越起自1902年成立的上海爱国女校。从该校宗旨中可以看出,它对以家庭为中心,强调保国强种的贤妻良母观已经有所突破,“出现了由以家庭为核心阐述女子价值向以国家、社会为核心阐述女子价值的转轨迹象”。^[51] 女学生参加爱国政治运动获得进步人士的赞赏,而女学生自身也将挽救民族危亡视为己任,她们中的一些人毕业后成长为杰出的政治运动家。

总之,由于近代江南女校办学主体的多元,因此办学宗旨大相径庭。西方传教士、中国男性知识精英以及进步知识女性通过各种课程向女学生乃至全社会传递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知识与东西杂糅的价值观念,不断发展的女校及其培养的渐趋成长的女学生,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筛检和扬弃,并大力推动了江南社会的变迁。

注释:

①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参见王德峰编:《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246页。

②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学术与文化》,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③熊月之：《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异质性》，参见张鸿雁等主编：《中国城市评论》（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④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8页。

⑤[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李上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

⑥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p. 35.

⑦“裨文”又被翻译为“俾文”，关于裨文女塾的建立时间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该校建立于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格兰德女士（后与裨治文结婚）于1850年在上海设立的女塾，1861年改称裨文女校”（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227页）。“这时除清心外，我国仅有教会设立的女学校四所，广州、宁波各一所，上海两所：一所为1850年美国自治会裨治文牧师裨文夫人所创办的裨文女塾，另一所为美国圣公会琼司女士所创办的圣玛利亚女校。”（董涤尘、钟寿芝：《前清心女中校史》，载上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页）也有认为该校建立于1861年：“一八六一年，俾文先生去世，夫人仍来申依圣公会，并设女校，以纪念俾文，故命名曰俾文。”（《圣玛利亚女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上海图书馆馆藏）还有认为该校建立于1849年。（Ida Belle Lewis,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11, p. 18）本文采纳目前较为公认的“1850年”为裨文女塾的建校时间。

⑧郑观应：《盛世危言》，辛俊玲评注，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⑨梁启超：《变法通议》，载氏著《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77页。

⑩当时的报刊中多用“中国女学堂”，由于主持女学堂实际工作的主要是经元善，故又被称为“经正女学”或“经氏女学”。

11、《记上海爱国女学校》，东京《女学报》第四期（1903年），载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007页。

12、《爱国女学校甲辰秋季补订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8月1日，载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1032页。

13、《常熟竞化女学校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10月19日，载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1038页。

14、《学部奏详议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章程折》，载《大清新法令》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1页。

15、同上，第439页。

16、《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载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7、乔素玲：《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8、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27页。

-
- 19、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pp. 68-69.
 - 20、上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解放前上海的学校》，第286页。
 - 21、《校史》，载《圣玛利亚女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 22、上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解放前上海的学校》，第290页。
 - 23、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载氏著《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206页。
 - 24、上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解放前上海的学校》，第307页。
 - 25、同上，第289页。
 - 26、同上，第296页。
 - 27、[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第115页。
 - 28、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p. 106.
 - 29、褚季能：《第一次自办女学堂》，《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3号，第129-131页。
 - 30、《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1899年6月），载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233页。
 - 31、同上。
 - 32、《无锡市第十二中学》，载无锡市教育局、无锡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无锡教育新篇》，1985年12月，第112页。
 - 33、唐原道：《漫话解放前的锡绣》，载政协无锡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五辑，1983年，第33页。
 - 34、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p. 115.
 - 35、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 36、《大清新法令》第三卷，第430-439页。
 - 37、同上，第439-449页。
 - 38、《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318页。
 - 39、[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第115-116页。
 - 40、同上，第99页。

-
- 41、同上,第115页。
- 42、同上,第115页。
- 43、刘王立明:《清末的女子教育》,载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993页。
- 44、MargaretEBurton, TheEducationofWomeninChina. pp. 182-183.
- 45、[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第117页。
- 46、[澳]李木兰:《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方小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 47、戴逸:《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李克主编:《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52页。
- 48、魏国英:《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 49、[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第115-116页。
- 50、同上,第115页。
- 51、谷忠玉:《中国近代女性观的演变与女子学校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